孔子执政思想刍议

欧阳矩明

孔子执政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影响深远,若能吸取其民主性精华,并发扬光大,必将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如:“政者,正也”、“政在选臣”、“富之”“教之”等思想都是孔子提出的治国方略。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级对其有不同的理解,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很多的合理因素,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。

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,一生匆匆汲汲。他做官从政的时间不长,但政绩显著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(在今山东汶上县)地方的宰臣,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,四方的官吏都向他学习。以后,孔子由中都宰升任主管工程的司空,不久又升为主管刑狱、纠察等事的大司寇。他56岁时,以大司寇的职位参预国家决策。参预才3个月,贩羊卖猪的商人就不敢哄抬价钱;行人男妇都分开走路,各守礼法;路上见了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敢拾回去;四方旅客来到鲁国的,不必向官吏请求,都被给予亲切的照顾。当时齐国人就认为,孔子长此主政下去,鲁国必会强大称霸。

孔子周游列国14年,风尘仆仆,备尝艰辛,其意在于干政,寻求“苟有用我者”。虽是“斥乎齐,逐乎宋、卫,困于陈、蔡之间”,仍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
孔子在进行私人讲学时,分设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。其中“政事”一科可以说是世界上设置得最早的政治学专业。他和他的门徒的言行录《论语》,基本上是一部有关政治的著作。《论语·为政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:

或谓孔子曰:“子奚不为政?”子曰:“《书》云‘孝乎!惟孝,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,奚其不为政?”

在孔子看来,宣扬、传授以孝悌为根本的仁学,就是参与政事,指导国家政治。

孔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执政思想,长期被奉为经典,影响至深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,不可一概将其视为“末日黄花”而予以排斥。若能吸取其民主性精华,并发扬光大,必将有助于我们“新造民族之生命,挽回民族之青春。”兹举其三,管窥其全。

一、“政者正也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^①

季康子是鲁国大夫,权位显赫。孔子回答他的问政时利用语源关系指出,政治的意思是端正,您带头端

正行为，下属和民众谁敢不端正呢？“政者正也”是孔子悉心考察社会现实所得出的结论，也是贯串其全部执政思想的一个论点。《论语》中此类议论相当多，例如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^⑧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”^⑨

孔子把执政者“身正”与政令畅通、治国安民联系起来，他认为，“为政以德”的执政者，必然是“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^⑩而要使执政者“身正”，应从何处着手呢？孔子在回答子路提出的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”的问题时明确表示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为什么首先“正名”呢？他接着解释道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^⑪

在这里，所谓“正名”，就是端正名分，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，履行与之相应的权利、义务和使命，不能有非分之想。孔子对执政者问政的对答中，大都突出了“正名”的原则。他虽然认为变革是可以的，制度有所损益也是必然的，但主张变而不乱，上下尊卑的原则不能动摇。其中显然有保守性的一面。不过，“正名”的原则对执政的封建地主阶级也是需要的，特别是大乱之后社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、社会秩序需要相对稳定的时期。这恐怕是孔子的学说长期为天子王侯和许多学者“宗之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“正名”的基本内容就是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所提出的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^⑫。在当时家国一体的宗法分封制度下，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往往是密不可分的，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。“君君”、“臣臣”，是指国家政权内部的权力行使的格局。“父父”、“子子”，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。孔子把“君君”、“臣臣”与“父父”、“子子”融为一体，这正是孔子执政思想的一个特征。他强调依靠道德的力量去约束和改造上层权力行使的格局，虽然道德制约和实际权力相比显得非常脆弱，当时一些诸侯国君实际上对其采取“可闻而不可行”的态度，然而，它蕴含着我国传统政治的精华，对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正如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一书中所说：中国君主职权虽大，但他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，因为他的随时督察固然必要，全部行政却以国中的许多古训为准则。在我国，长治久安的王朝，总是大力倡导和推行“为政以德”的古训。其政治体系中的首脑君王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恪守“正名”的原则，作为社会教化的典范。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，都与最高执政者实行孔子“政者正也”的理论原则有关。

孔子2000多年前提出的“政者正也”这一命题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。毛泽东说过：“‘正名’的工作，不但孔子，我们也在做。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，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，孔子是名为主，我们则是实为主，分别就在这里。”^⑬对于这一命题，尽管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，但处于执政地位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，要想巩固其国家政权，稳定其政治秩序，除了强化暴力机器之外，还必须用本阶级的政治道德去教化本阶级乃至全社会的成员，而教化的力量则首先源于执政者的“身教”。正如孔子所指出的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^⑭

二、“政在选臣”

在我国古代，执政者不是君王一人，而是君与臣组成的共同体。《尚书·益稷》所载的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”，就是对这种执政体制的颂扬。孔子赞同这种执政体制。当鲁哀公向他问政时，他说：“政在选臣”^⑮。这是孔子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。

管仲曾是齐恒公的仇敌，企图射杀桓公，但桓公不念旧恶，任用了管仲，成就了霸业。孔子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至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君其被发左衽矣。”^⑯

鲁昭公二十年，齐景公与晏婴来到鲁国。景公问孔子：“昔秦穆公国小处僻，其霸何也？”孔子说：“秦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僻，行中正。身举五刑，爵之大夫，起累继之中，与语三日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虽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”^⑰在孔子看来，良臣可以弥补君王的不足，使国家避免败亡。

孔子谈到卫灵公,说他荒淫,一切不合礼法。季康子说:“夫如是,奚而不丧?”孔子说:“仲叔圉治宾,祝蛇治宗庙,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,奚其丧?”^⑫

在论述“选臣”重要性的基础上,孔子提出了“选臣”的标准,即“尊五美,屏四恶”。所谓五美,即“君子惠而不费,劳而不怨,欲而不贪,泰而不骄,威而不猛。”所谓四恶,即“不教而杀谓之虐;不戒视成谓之暴;慢令致期谓之贼;犹之与人也,出纳之吝,谓之有司。”^⑬可以说,“尊五美,屏四恶”,是“仁义”、“忠恕”之道的具体化、条理化,是孔子执政思想的实施纲领。按照“尊五美,屏四恶”的标准,孔子还对宰臣提出了一系列要求。例如,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与之比。”^⑭“居之无倦,行之以忠。”^⑮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,在家无怨。”^⑯“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。”^⑰可见,孔子在选臣问题上特别重视德行。同时,他也并没有忽视学问和才能。

孔子的弟子子羔尚幼,学业未成,子路派他去做费县县长。孔子说: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说:“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以读书,然后为学?”孔子说: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但孔子也不赞成“为学问而学问”,他说: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以为?”^⑱

孔子不仅注重实际才能,还主张因材施教。他认为仲由、冉求不能说是大臣,而可以说是“具臣”,即具有一定才能的臣子。他们的才能又各有特点,应该从事不同的政事。“由也果”,“求也艺”^⑲。“由也,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。”“求也,千室之邑,百乘之家,可使为之宰也。”^⑳至于子贡,孔子认为他通达事理,适合做外交工作。事实证明,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正确的。子贡为阻止齐国对鲁国的进攻,曾进行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。其结果使鲁国保存,齐国大乱,吴国破灭,晋国强盛而越国称霸。10年时间,使五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,显示了子贡卓越的才能。

至于“选臣”的办法,孔子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见解。他提倡和鼓励“荐贤”,认为“知贤,智也;推贤,仁也;引贤,义也。有此三者,又何加焉?”^㉑还要求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来自民众的意见,“众恶之,必察焉;众好之,必察焉”^㉒。与此同时,要注重本人的言行,“不以言举人”^㉓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^㉔，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”^㉕这种见解显然具有合理性。

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,“行”即实践,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、理论、计划、方案以从事变革现实的活动,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,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。孔子所讲的“行”当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,而主要是指个人的行为。但他要求在“选臣”时着重于“观其行”,这对于减少主观随意性,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三、“富之”、“教之”

执政者如何对待和引导人民,是关系到国家兴衰、政权存亡的根本大事。孔子对此问题的回答,也有可取之处。

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“庶矣哉!”冉有曰:“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”曰:“富之。”曰:“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”曰:“教之。”^㉖

在赞叹卫国人口稠密之后,孔子提出了“富之”、“教之”的主张。显然,“富”与“教”的对象,不仅是在位者,也包括平民百姓。

对此主张,以“安贫乐道”而享誉孔门的颜渊,是领悟至深且深表赞同的。他向鲁定公说过:“臣闻之,鸟穷则啄,兽穷则攫,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,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”^㉗人民生活要富裕,就要发展生产。要发展生产,就要使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有所改善,使他们的生产兴趣有所提高,不再逃亡,并使他们“近者悦,远者来。”^㉘孔子要求“使民以时”,“择可劳而劳之”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”^㉙选择劳动者可以劳动的时间、地点和对象再去叫他们劳动,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,并给他们可能得到的实惠和好处。同时,他指出君王的“足用”要以人民的“足食”为基础,强调“政在节财”^㉚。他还大声疾呼:“苟政猛于虎

也！”^⑥

孔子在重视人的物质生活的前提下，特别强调人的精神价值。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治国方略：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子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^⑦

“足食”、“足兵”是民信之的基础和前提，“足食”是安邦治国的首要任务。但是，如果“足食”、“足兵”与“民信之”二者不可兼而得之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孔子的回答很明确：去“兵”与“食”，而取“信”。因为自古以来人的自然生命固有一死，而作为生命本质的精神价值却是永恒的。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赖，就站不住脚了；一个人失去了信义，也就毫无价值了。在孔子的心目中，富贵也好，贫贱也好，只要合乎仁义之道，就值得赞许；如果违背了仁义之道，无论富贵或贫贱，都是可耻的。因此，人们应该“见利思义”^⑧、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^⑨、“行义以达其道”^⑩。孔子把这种进步的财富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，以致于当他以布衣终其一生 300 多年后，太史公仍然对他怀着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的敬意。

怎样达到这种价值目标呢？孔子认为，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^⑪对于仁义之道，人们并不是“生而知之”，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得到的。所以，他主张“教之”。

教化的内容是以孝悌为中心，孔子要求弟子们先具备孝、悌等品德，再来学习文献方面的知识。孝悌是齐家的必要条件，在社会的各层中，家庭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。我国古代的“封建”本是从家庭关系中延伸出来的，“国”与“天下”也都是以“家”为范本。因此，孔子又说：“孝慈，则忠。”^⑫他的弟子有若对这一论断作了透辟的解释：“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^⑬这实际上讲明了内圣与外王，亦即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。从天子到老百姓，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，必然导致齐家。从最终发展的角度来看，齐家必然导致治国平天下。如果放纵自己的财富欲、权力欲及其他私欲，上下交相争权夺利，乃至政治盗贼四起，社会瘟疫流行，那还有什么正常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呢？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呢？孔子孜孜不倦地从事和倡导教化，志在提高人们“克己”的自觉性。当然，克制私欲，并非易事，亦非单凭教化之力所能毕其功。但是，放弃或削弱了教化，则不足以治国平天下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综上所述，“富之”与“教之”，二者若缺其一，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。“富”是“教”的物质基础，“教”是“富”的思想前提。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，思想的社会关系反作用于物质的社会关系。在我们创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，应该批判继承孔子的这份思想遗产。

注 释：

①⑥⑬⑯⑳ 《论语·颜渊》

②⑤⑧⑫⑲㉑ 《论语·子路》

③⑩⑫㉓ 《论语·宪问》

④㉕ 《论语·为政》

⑦ 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第 145 页。

⑨⑪㉒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

⑬㉔ 《论语·尧曰》

⑭ 《论语·里仁》

⑰㉒㉔ 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⑱ 《论语·雍也》

㉑ 《韩诗外传》卷七

㉒㉓ 《论语·卫灵公》

㉔ 《荀子·哀公》

㉕ 《礼记·檀弓》

㉖ 《论语·学而》

㉗ 《论语·季氏》

㉘ 《论语·阳货》

(责任编辑 叶娟丽)